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20年第23期

总第(489)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20年12月15日

目 录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发展路径(笔谈)

..... 樊丽明 杨灿明 马 骁 刘小兵 杜泽逊 (02)

用科学精神引领新文科建设..... 张 江 (06)

新文科建设需要解决好的三个前置性问题..... 武宝瑞 (09)

新文科:本质、内涵和建设思路..... 陈 凡 何 俊 (12)

新文科的学术范式与集群化..... 季卫东 (16)

新文科建设的三个理论前提..... 王 永 (19)

跨越边界的思考:新文科视角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探索

..... 王震宇 薛妍燕 邓 理 (26)

编者的话:新文科建设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一种积极探索。201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计划2.0的意见》,“新文科”概念初现端倪。其后,教育部相继在《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系列文件中反复提及与新文科相关的理念和措施。为了更好把握“新文科”的概念内涵与外延,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我国新文科建设。本刊以“新文科建设”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王者鹤

责任编辑:李 璐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二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191

电话:(010) 82289239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网址:www.cahe.edu.cn(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动态栏目)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发展路径（笔谈）

樊丽明 杨灿明 马 骁 刘小兵 杜泽逊

对“新文科”之“新”的几点理解

樊丽明

（山东大学校长、教授）

现在提倡加快推动新文科建设，“新”从何而起？“新”在何处？何为文科新需求？2017年美国西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概念，他们所阐释的新文科主要是专业重组，不同专业的学生打破专业课程界限，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2018年10月，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中国新文科开始浮出水面。建设新文科就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提升时代性，加快中国化、国际化进程，引领人文社会科学新发展，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人的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第一，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化发展。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的影响。新科技革命已经到来，并正在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随着新科学的发展，人类创造了很多新知识，带来了许多技术突破，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基因工程、虚拟技术、5G技术等，这些不仅与信息学科密切相关，而且与文科联系很近，对文科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新科技发展，对新产业、新业态产生了影响，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营销、互联网+教育，在我国新技术推动产业革命，使得业态更新非常快，产生了很多人才的新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培养出知识更复合、学科更融合、实践能力更增强的新型人才，同时应催生新专业，更新已有专业。新科技革命之后，很多简单劳动趋于被软件或者机器替代，这给文科人才培养带来一些新的需求，如新专业、培养方案的调整、新课程的产生和替代。与此同时，文科会发现很多新课题，研究范式也会转变。文科之新，首先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反逼我们思考新问题，更新方法、拓展学术视野。

第二，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历史节点是“五四运动”一百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刚刚过去40年。在这样

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的文化态度是什么？大家都认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百年来最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期，回过头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文科教育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研究者，如何对优秀文化进行传播和研究？2013年11月，习近平考察孔子研究院，指出一定要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紧密结合，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创新性发展当中的研究人才、传承人才，还是创造性转化当中的文创人才、文旅人才，都是新文科要面临的任务，都需要考虑文科的新气象、新要求。

推而广之，文科发展和文科教育除了培养专业人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文化人，即新文科很大的任务是要面向高校所有的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以及面向社会、面向全民进行基础教育。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具体问题。如，①如何着力培养基础扎实、通古博今、创造力强的中国文化研究人才，以承担创新性发展职责？②如何着力培养知识广博、通晓中外的跨文化研究和传播人才，以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交融？③如何着力培养知识复合、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强的文化创意人才，以实现创造性转化？相比而言，中国现在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理念先进性与实践先进性是不够的，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支撑力还不够强。④如何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高质量通识教育，并进行有效的社会推广，从而树牢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第三，进入新时代与文科中国化。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科学遇到一个突出问题：过度西化和量化。浙江大学邵培仁老师说文科中很多基本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文科研究对西方学术有一定的依赖性，甚至部分学科的依赖性相当强。如果从理论方法到思维表达都是西方的，参考文献也全是西方的，就很值得我们反思了，甚至值得我们忧虑了。明了一些，就是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发展经验，总结提炼到经济学层面上是不够的；管理学在发展过程当中，总结自己的管理案例，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管理经验的总结提升也是不够的。在经济学、管理学这些门类上，中国化的任务很繁重，也尚未完成。其中过度量化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具体表现在关注微观、忽视宏观，技术至上、忽视思想。

如何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加快构建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特点的特色哲学社会体系？其中涉及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都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具体分析方法有所进步，但是在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人才方面仍有待提高。在教学过程当中，在培养方案修订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思考是否存在重术轻道的倾向。

第四，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世界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大的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各种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以中国重返联合国为标志，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也有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理念，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的关键是人才培养是否跟进。关于全球治理的人才，现有储备和供给均不足。我们急需培养一大批适应全球新格局的高素质国际专业人才，如外交人才、国际经贸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国际新闻人才、国际专利人才。

从四个维度来看新文科之“新”

杨灿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第一，从时间维度来看新文科。中国有世界唯一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与文明，所以，文科一定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的，不断挖掘凝练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价值，这是新文科首先要做到的，也是过去做得不够的。我们的文科一定要是知道走过的路，知道现在所处的方位，并明了下一步前进方向的新文科。以法学为例，现在提到法学，就言必称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我们能否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总结升华出中国自己的法系；一个五千年不断的文明，如果没有法，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真的没有，只能说明法不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文化文明中来挖掘凝练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新文科建设的第一个任务。

第二，从空间维度来看新文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但要参与国际化，还要引领国际化。所以我们的文科一定要是既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又不断产生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的新文科，是站在国际视角、站在世界舞台来进行建设的新文科。

第三，从世界观、价值观的维度来看新文科。学科首先是用来教育培养人的，而人的培养与教育首要是人格的塑造、道德的修炼、境界的提升。所谓立德树人，首重立德，其中文科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的文科必须是首先立足于培养人的独立人格、高尚情操的新文科，是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维护人类的尊严、保护人类文明的新文科，是更加注重价值层面、而非知识层面的新文科，是回归于道、而非纠缠于术的新文科。

第四，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维度来看新文科。万事万物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学科的建设都要强调宽口径、厚基础，我们的文科一定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拥抱科学技术的新文科，实现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等不断交融交叉的新文科，是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密切联系的新文科。

另外，人类的创新活动其实主要是依赖三种知识：默性知识、交叉知识和实践知识。其中默性知识可能是更重要的，它特别强调悟性和领悟力，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加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与修炼。所以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非常明确地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不如说我是一个哲学家”，即哲学给了他更多的启迪。这是在今后培养创新人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不要一讲到创新就是理工科，就是搞项目，就是搞专利转让，文科对于创新起到一种启迪智慧的作用。

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

马骁

（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动因也许是为了适应“文科的新要求”和推动“新的文科建设”以最终适应新经济、新科技发展的要求，但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标应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科学和

社会科学。新文科建设为了实现该目标需要重视一下问题。首先，要坚持从1到N与从0到1的高度统一，突出原创性。从1到N说的是传承绵延与递进；从0到1说的是原创。当下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批判性地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针对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其次要凸显对“人”认识的深刻性。人文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研究人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受到人的特性的型塑”，对人的特性的认识往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比如“从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说、制度学派的‘文化人’假说再到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文化人’假说的范式转换，既反映了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历史，也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日趋成熟。”但在范式转换过程中，西方经济学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因此有人认为经济学范式转换核心也许在于重新界定理性。最后应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新文科建设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必须坚持立足中国，融通中外。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应是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跨学科研究。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导致了学科边界的形成及其不断被突破。知识生产者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等往往并非单个学科所特有，多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自然不可避免，这是人类知识生产过程的辩证法。近现代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乃至新学科的产生，常常是在不同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实现的。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跨学科研究也意味着必须创新制度、搭建平台，把其他学科的优秀学者引进来，以突破现有“科学共同体”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局限。

新文科建设的根本是优化课程设置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新文科建设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素质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优化课程设置体系，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对新文科的思考和看法

刘小兵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首先对于传统文科，我认为现在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传统文科的划分越分越细，彼此之间的

隔阂越来越大。二是大家的功利性太强，学科地位高低往往受到毕业生就业情况好坏的影响。三是对文科的实质理解关注度不够。

根据教育部的学科分类标准，学科划分为自然科学、农业、医药、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等，专业又分为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划分应该是基于研究问题的差异，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以及各个现象之间的关系，农科、医科、工程研究的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再细分下去，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文科学更多的是研究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理解的文科就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自己之间怎么相处的关系。因此，文科更多的是研究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情感、一种思想，而不是将人作为一个自然体来研究，所以文科的研究一定要回到以人为本。人有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理性的，人是互相尊重的，人是文明的。

由于传统文科忽略了文科的本质，太功利，越分越细，各占自己的山头，导致文科发展到最后，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价值关怀和社会文明关注度上出现了问题，人文关怀和人类情感有所缺失。这可能是现在文科发展当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它不仅在中国出现，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

对于新文科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认为，应让文科在研究中国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发声，形成中国学派，同时关注最新的科技发展，采用跨学科思维，让文科研究跟上时代步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也提到，加强新文科建设要把握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最后要形成中国学派。这是在提新文科概念的时候，官方给我留下的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目的性很强，要建立中国学派，要打造新时代下的文科，即我们所称的新文科，它要在世界上发声，要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对此，我补充几点意见。

一是新文科的提出与传统文科的不足似乎没有直接联系。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主要不是解决传统文科当中存在的一些发展瓶颈，而是要打造一种全新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建设新文科，一定注意不能遮蔽，要更加凸显文科的本质，即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新文科新在交叉融合。它包括三个方面的交叉：最大层面是文理层面的交叉，其次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还有社会科学内部的交叉。现在能够做的、也更容易做的是社会科学内部的交叉，但很多高校可能缺少人文的基础，就比较难做。而对于有些高校要搞文理之间的交叉估计也有难度。

三是现在新文科的定位不是组织形式上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教育内容的改革，教育的内容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是要注意剔除功利性导向。培养人才不能仅仅以市场为导向，要更多以学科科学角度来考虑，不能认为对市场有用的才是学科。但是目前存在特别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倾向，如果毕业生就业率比较低，可能校长会被问责，就业不好的专业学科就撤销了。这是在新文科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的新问题，也是我们要避免的旧问题。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与国学人才培养

杜泽逊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国家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很高的高度，认为这是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所需要的重要的活水源头。按照中央的精神，许多高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昌大学等都开办了国学班，虽然名称不同，挂靠单位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要培养国学人才。尼山是孔子诞生地，山东大学的国学班取名为尼山学堂。李学勤先生曾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就是儒家的经典之学。我在李先生表述的基础上加一句话，经学的基础是小学，所谓小学就是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学习国学第一件事情是认字。

国学人才应该如何培养？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国学在当代学科体系中并没有设置，可是国家又急需新时代的国学专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培养，如何能够出现呢！高端的国学人才断档是我们继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中的危机，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山东大学和其他高校在多年前创办国学班有深刻的现实原因。2012年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在学校直接主持下成立，尼山学堂依托于儒学高等研究院，在制订培养方案时，第一个任务是制订课程体系，参考其他学校的开课，经过反复研究，学堂制订了一个很完善的开课体系，其中原典

导读有《周易》《尚书》《四书》《说文解字》《老子》《庄子》等必修课，通论课有音韵学、中国史学简史等。第二个任务是请高水平教师，从全校中文历史哲学各学院以及儒学高等研究院，或者其他高校共聘请了49位教师。第三个任务是把真正爱好国学、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招进来。山东大学的办法是在大一学年下学期招收，即转专业的时间，全校文理工农医在读学生都可以来考；武汉大学最初是在高考环节进行招生，高考招来的学生不稳定，到班上以后，发现他们对国学的理解偏差非常大，之后武汉大学也采取了从大一下学期招一部分学生的办法。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开得好课程，请得好老师，招得好学生，第四个任务就是培养，要培养国学基础深厚、学术创新能力强、思想品德高尚的人才。其中“基础深厚”，可以在开课和聘请教师方面解决；在“创新性”培养上，我们认为创新型与知识型两种国学人才，前者善于著述，且能得到公认、能够传世，而后者会背五经四书、熟知相关内容。创新型人才必须是知识性的，否则就会轻率著述，哗众取宠，经不起时代的考验，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不需要的人才。

尼山学堂充分重视基础教育，同时制订了创新培养方案，如论文报告会制度。每年一次论文报告会，每人都要参加，先上报题目，根据题目在全校和其他高校找教授一对一指导。开报告会时，有8个教授负责评议打分，这个分数占毕业总成绩的10%，权重非常大。国学班的学生不一定“之乎者也”，培养人才必须要因材施教，必须考虑到学生情况；同时如果没有高水平教师指导，学生也很难成长起来。

培养国学人才，无法只依托于一个学院，需要破除障碍，打通文史哲，跨学科、跨学院、跨学校请教师。只有这样，才能办好国学班，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樊丽明，山东大学校长、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杨灿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教授，湖北武汉 430073；马 骁，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四川成都 610074；刘小兵，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上海 200433；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0期)

用科学精神引领新文科建设

张江

新文科建设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引起教育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都在关心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它关系到人文社科自身的发展创新，关系到人文社科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文社科如何适应日益深化的社会变革，如何服务日新月异的時代需求。归根结底，新文科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学科自身，更在于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科建设不是一般性、补丁式、表面化的创新，而是学科定位、专业布局、评价体系的全面创新。

全面创新当然是一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有一个突破点。这样一个突破点，要能够从根本上创新人文社科的学科特征，还要能够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笔者认为，这个创新点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我们知道，学科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知识分化的结果。学科的形成既与知识的分类密切相关，也与知识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密切相关。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结构，规定着学术生产的理念、方法、目标和流程。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它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重新分割了这个世界，重新构成了这个世界。甚至可以说，世界因学科而断裂。

比如，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意思是说，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分家”的意思不仅是“不要分家”，而且是“不能分家”。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从人才培养，还是从科学研究来看，文史哲不仅分了家，而且隔膜越来越明显。又比如，我们经常讲，诗乐舞在起源上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在现代学科体系中，诗乐舞相互之间的壁垒越来越严重。再比如，对文本的阐释问题，或者说阐释学的问题，它是有关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属于基础学科，甚至应该说属于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学科。阐释学以哲学、

文学和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涉及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等问题，反映出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我们可以说阐释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其本身就是“反学科分化”的一个结果。这当然不是要否认学科分化的意义。事实上，没有学科分化，就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文明，没有现代文明，我们也就不可能在这里坐而论道，探讨学科交叉融合的意义。

笔者所要强调的只不过是，学科分化让我们掌握了更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的种种显微镜，让我们拥有了更轻松地看到远方世界的种种望远镜，但是，这些显微镜或者望远镜很可能是有色眼镜，它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也同时向我们遮蔽了这个世界。就这个意义而言，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实际上就是要突破学科分化的这个有色眼镜，尽可能地面对世界本身，面对事物本身，回到问题本身。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新文科建设，是人文和科技的融合问题。60年前，英国学者斯诺在演讲中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双方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校教育太过专门化。斯诺的演讲尽管论证粗疏，也没有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本身却是非常关键。而且，60年后的今天，人文与科技之间，仍旧是壁垒森严。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也深有感触。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专家，其中有些专家被老百姓戏称为“砖家”。为什么会这样？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但是有一点，我认为也和现代社会的学科分化有关系，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脱节有关系，体现在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脱离社会现实，视野、格局和方法上都严重受制于所在学科的规定性，受制于这种规定性带来的种种局限性。因此，自然科学研究如果不融合一些人文精神，或者不在人文精神之光的照耀下发展，它的意义和方向就可能出问题；同样地，人文科学研究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如果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它的结论和价值也必然缺乏坚实的根基。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两个维度，它的均衡发展尤其重要，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最高的层次上是同源的、统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着重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人文科学则着重于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整个学术史其实既是一个学科不断分化、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学科不断交叉、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融互渗。现代社会，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日益加大，界限日益清晰；从内在关系上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人文科学的引导，人文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就是要逐步打破学科之间的既有界限，以交融互渗、协同共享为途径，对传统学科进行改造、转型和升级，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路径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模式创新。简而言之，交叉融合是发展趋势、是创新路径，也是无法绕开的现实需要。

那么，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应当从自然科学中吸取什么？笔者认为重点有二，一是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二是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

首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到人文研究，科学精神就是立足客观事实，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务实；按照基本逻辑规则梳理思想，表达见解。坦言之，人文研究缺乏科学精神的问题相当普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阐释文本的意义，应该从文本出发，依据文本，有理性，有逻辑。不从文本找根据，不讲基本的逻辑关系，那阐释的还是这个文本吗？阐释还有什么理性可言？有什么价值可言？当代西方文艺

理论讲文学阐释的开放性，这没有问题。但是，只讲开放，不讲约束，只讲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讲一千个哈姆雷特仍然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堂吉珂德，也不可能变成玛格丽特，这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对文本的阐释是一个不断从文本出发，又不断回到文本，不断放飞意义，又不断从文本中寻找意义起降点的过程。不讲根据，不讲逻辑，阐释从何而来，阐释的价值又如何实现？

研究阐释，就要研究阐释的规则，研究阐释学的基本概念。概念混乱，阐释学作为一个学科还能有什么意义？最基本的，到底是“阐释学”“诠释学”，还是“释义学”“解释学”？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不同的阐释路线，关系到中西阐释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大家可以有争议，可以相互保留意见，但不能说这个问题不重要。再比如，文学作品意义的开放性问题，一直以来学界对此争论不休。安伯托·艾柯写了一本《开放的作品》，于是许多人就跟着喊作品是开放的，把阐释的开放当成了作品的开放。可是，阐释具有开放性就一定意味着作品具有开放性吗？阐释具有无限性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的蕴含具有无限性吗？作品和对作品的阐释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着眼于作品的自在规定性，后者着眼于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规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在规定性否定关系规定性，但也不能因为关系规定性而否认自在规定性。毋庸讳言的是，很多关于文本阐释的讨论中，存在着基本概念混乱、概念的内涵游移不定，甚至是偷换概念的问题。包括艾柯自己，在丹纳讲坛上，主张作品开放性的艾柯，当别人任意阐释他的文本时，他就不同意了，说自己的文本没有那么多意思，没有别人说的那些意思云云。

缺乏科学精神，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缺乏独立思考、追求思想进步的精神。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文研究就是低水平的重复。重复古人，重复洋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说自己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话。动辄某某古人说什么，某某洋人说什么，就是没有我自己说什么。这当然和人文科学自身的特点有关系——人文科学的很多问题、基本性的问题，都是已经讨论了两千

五百年还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能是拾人牙慧，只能是“嚼别人嚼过的馍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脱离古人的历史语境，脱离洋人的现实情境，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把古人或洋人的片言只语当作金科玉律，当作普遍真理，当作不可逾越的雷池。其实这都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表现，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是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表现。比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曾经宣告形而上学的系统哲学的终结，宣告分析哲学走入了死胡同，但他也同时坦陈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我们的文艺理论、我们人文学科不去关注罗蒂思想的发展变化，不去研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和得出结论的方式，而是固守于罗蒂几十年前的观念，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归根结底，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追求思想进步的科学精神。

与科学精神相关联，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人文学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价值追求，但是它的价值追求从来不能脱离人的存在的客观性；人文学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人文学科有自己的边界，但这种边界也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的借口。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文学科的发展一直就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近代实验科学的崛起，转变了人们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认知，也转变了人文学科研究演进的路径，可证实性和逻辑性进入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这极大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人文学科一味固守于本质主义或者非本质主义的自我追问和思辨，无视人存在的客观性，通过开放的边界保持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其功能的发挥和价值的展现得不到自然科学的有力支撑，就很可能自我封闭并从而走向自我循环的死胡同。

笔者在研究阐释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时，便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准确地说是引入了数学中 π 和正态分布的概念，用前者来描述阐释的有限

和无限问题，用后者来描述阐释的公共性问题。从路线上，阐释可以分为“诠”和“阐”。其一，“诠”的最终追索，是文本的自在意义及作者的本来意图，它的展开和实现，如同于 π ，无限且连续，各点位之间相互依存，以至互证，共同诠释 π 的无限意义。对“诠”而言，约束，有限，是为追求，但同样具有无限空间。其二，对“阐”而言，开放，无限，是为本征。“阐”是无限的，但无限的“阐”是真的能够永远无限下去吗？“阐”的有效和无效有没有一个可资判定的框架或标准？事实上，一般阐释结果的分布形态，就是概率分布。面对确定的哈姆雷特，100万人的理解和阐释离散多元、不可预测。但是，众多的阐释结果，其分布将是标准的正态分布，服从正态分布曲线的描述。此分布规律，用于阐释学分析，其横轴为现象或文本呈现，其中线为公共理性对现象或文本意义的期望或可能接受结果，全部独立阐释的结果分布于曲线面积之内。相比西方同类理论，正态分布是呈现和说明阐释无限与有限关系的最好方法与工具。需要说明的是，与对自然现象的正态分布描述不同，阐释作为精神现象，其公共期望与方差很难定量，但是随着大数据的引入和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普及，这种借助数学模型对精神现象的描述，其意义或可进一步期待。这是笔者在人文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一种尝试，成败自有评说，但这种尝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在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学科交叉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要用科学精神来促进人文研究，引领新文科建设。因为，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而言，自然科学的具体成果固然重要，然科学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立场、信仰、思想方法才是关键。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北京 100732）

（原文刊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新文科建设需要解决好的三个前置性问题

武宝瑞

如果孤立地谈论新文科的建设，简单地把新工科、新农科建设的概念和体系平移延伸过来，贸然、仓促地提出新文科建设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立论。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新时代社会变革对人文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需要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实质性地有效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新文科的建设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应该看到，当下新文科建设还处于起始筹划阶段，需要解决好三个前置性问题，这就是准确把握其新时代特质，明确其知识创新的根本使命，确立其融合发展的崭新路径。

一、准确把握新时代特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新与旧的关系一直是思想发展、社会进步、学术研究纠缠不休、常论常新的问题。社会和学界基本秉持泛进化论的意念，大都认同的是新比旧高明、深刻、进步的认知，凡事只要沾上新就自然多了几分体面，俨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甚至是以新旧论是非，以新旧划界限，这样的观念和心态在过往的历史中，既有推动社会进步、思想建设、学术发展所取得的功绩与成就，也有沉重的经验教训。站在今天的立场，辨别新旧问题，厘清新旧边界，可以用更高的站位和更开阔的视野加以判别。所谓的新，不是用来博眼球的，更不是用来拼套路，其根本使命是要推动学科体系的建设，为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找到可以依托的逻辑起点。

新时代的新，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历史背景之下，时代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环境有了全新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站在时代巨变的历史潮头获得了新的研究立场和眼光，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必然会带来人文社会

科学新的发展气象与景象。

新文科的建设特别要准确把握新时代的特质和对人文社会发展创新的整体需求，要注意到新时代我们观察世界、审视自我的角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时代跨入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即将迎来的伟大复兴成为整个世界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必须紧紧跟随这个根本性的变革，聚集自身跟随新时代的理论抱负和人文理想，成为新文科建设驱动下推动新文科建设的新人。新文科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培养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的新时代人才培养不仅要求我们用新的思想教育学生，更要看到学生本身也是新的群体人。我们在观察新一代的时候，关注点往往容易集中在他们与其前代相比的负面性和差异性以及不符合旧时代精神的种种特性，很少注意他们与前辈相比较，更具有当下时代的契合性和适应性。作为受教育的对象，他们也在时代的熏陶下成长，他们身上的新的时代烙印比上一代、上上一代深刻得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察与认知，不能把新文科建设的使命和目标传导到所培养的新一代人身上，新文科建设的前景无疑是暗淡的。成长环境、推进主体、培育对象在新时代的种种变化是新文科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要义。

新时代新文科建设的新，是从旧的历史中延伸过来的，是在旧的根基上生长起来的，这与过去曾经有过的除旧布新、破旧立新截然不同。现时代的新与旧，最根本的是从旧到新的发展问题，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着重把握从旧到新发展的增长性。如果没有对旧的深刻了解，对旧的问题局限以及对新时代种种不适应的理性认知，就无法在旧的基础上改变、提升，成就新的

拓展。新文科建设中的新和旧，在内容、形态、路径、目标等方面既有不可忽视的差异，又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把握住这两个方面，才能真正推动新文科的建设和发展，文科才能顺应时代召唤，有效地新起来。新文科要做到研究与传播形式的创新变革、研究内容的升级迭代，必须特别关注到新与旧的连贯性。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承载着传承文化、承续传统的历史职责，在知识传播的方式上更加注重秉持厚重传统，不能简单地在一个时间的截断点上贸然提出新旧问题，否则就会违背学科的发展规律，扰乱学科正常的发展节奏，最终对学科发展造成伤害。

二、明确知识创新使命

用创新理论观照蓬勃发展的现实，是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使命担当。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跨越，探索创造了适合国情、符合实际的国家管理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变化深刻、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延续发展、光大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推进了中国人民与人类世界以及各个民族、国家的交流交融。这是二十世纪人类时代和历史最重要的创新成果。这一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蔚为壮观的辉煌景象需要用一套崭新的理论框架、思想支点、学术方法阐释，使之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固化图景，成为世界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面对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现实创新发展的辉煌图景，理论阐述和思想提炼明显滞后而且显得苍白。用学理的方式阐释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的发展变化，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起始点、核心内容和发展方向，现实和实践为这一使命提供了理论研究创新的丰厚资源，也昭示了创新发展的根本路径。新文科的建设需要

承担起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取得与辉煌的实践成就相得益彰的理论成果，既向世界阐明中国发展奇迹的合理逻辑、理论根源，也为中国人民提供砥砺前行、凝聚力量的精神动能。

创新是新文科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需要依托的内在驱动力。创新必须是真正有效的知识创新。其关键的要点是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把握世界人文科学发展趋向，推动各个学科能够站在现有的知识前沿，站在已知和未知的临界点上，面向未知的领域，把历史发展的实绩转换成固化的理论和可以采纳的行动方案，创造出真正有效的新知识。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知识创造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真正有效的知识创新的历史机缘都十分短暂，有效的知识增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人类在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创造的原创新性知识是非常有限的。绝大多数的理论和思想发展都是已有信息的分布重组、时空替换和拆分重合。看似眼花缭乱、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蕴含的有效知识往往非常有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耳熟能详、广泛运用的经典的知识体系、基本原理、思想原点很多并不是二十世纪以后提出来的，其内涵和外延在二十世纪有效、创造性拓展的途径和尺度也是有限的，仔细分辨起来经常显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为新的有效的知识创造和增长提供了丰厚土壤和绝佳机缘，新文科的建设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使命担当，不惧艰难险阻，推进有效的知识增长和知识创新。新文科建设必须坚决反对利用各种五花八门、掩人耳目的范式、模型、框架，对固化的知识和已有的信息进行重合、重组、重复、重构。

三、推动交叉融合发展

新文科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新文科的交叉融合应当是全方位的。要注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方法的融合，也要立足于学科内部之间的融合，比如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

的融合交叉。就更大背景而言，注重古今融合、中西融合，既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传统，也是在新时代、新环境之下创新发展的重要支点。

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交叉是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之一，交叉融合的基本方式和内容是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侵入和影响人文社会科学。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浪潮汹涌澎湃，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背景之下，就世界整体而言，从思想、方法一直到价值判断都是技术决定论占了上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的话题中谈论的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科学很少在同等层级上讨论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问题。在这一波交叉与融合的热潮中，人文社会科学借助自然科学精确化、数据化、工具理性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提升和发展，取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另一面是，由于采用过于简单的交叉融合方式，在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技术路径上照搬、迁移自然科学的一些浅层次做法，直接植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用自然科学研究中最简单的方法给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架构披上一层技术工具的外衣，以貌似创新的假面具把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再重述一遍，这是不足取的。

互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融合交叉引入了新境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更提出了新的挑战，造成了新的冲击，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所形成的舆论波以爆发式的激荡席卷了整个社会，让从事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感到阵阵寒意，以为这世界的未来完全就是数字化的天下了。互联

网时代的信息化技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造成的影响、冲击是客观的，但其中带来了信息获取、研究手段的变革又是推动发展的利器。在人为推动的喧嚣浪潮平息之后，我们发现，人还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自然科学的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还是工具、手段和技术方式的问题。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工具手段固然有可能影响思维方式，有可能对本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根本上不能颠覆人文社会科学在价值构建、审美判断、文化传承这些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力量。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一定要有客观的认知和理性的观察，要切实地评估人文社会科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跟自然科学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有明显不同的特质，这个最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不可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充分融合，无缝对接，所以融合是有限度的。要明确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在自身研究发展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的迁就之举，而是为寻求创新突破探索面向未来的路径。交叉融合要立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核问题和根本需求，坚守自身发展的本位和学科特质。一定要避免过分强调工具理性，以免造成本末倒置，损害自身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想的交叉融合要在精研细化的基础上做到润物无声，至臻化境。

（武宝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100872）

（原文刊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新文科：本质、内涵和建设思路

陈 凡 何 俊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旨在切实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同时，将2019年定为新文科建设启动年，“新文科”因此而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中需要认真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文科包括了人文与社会科学，我国通常概之为哲学社会科学，无论怎样称呼，具体所指的学科系统大家应该是清楚的。因此新文科建设，关键是在于这个“新”是指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个，才谈得上如何建设。

一个最熟悉的提法就是，新文科要努力进行学科交叉，在学科边界上形成与拓展新的知识领域，尤其是要与科技相结合，实现文理交叉，对文科来说，就是提升文科的科学性，从而推进新文科的建设。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以此来理解新文科，似乎又只是老话新说，因为强调文科的科学化几乎是现代中国学术自始即高悬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如果说具体一点，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在文科中的运用，就是刚过去了的潮流。文理交叉是如此，跨学科交叉也是如此。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跨学科交叉、文理交叉是新文科的建设内容，这样的交叉当然是推进包括文科在内的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问题是跨学科交叉或文理交叉，一直以来是强调的，这里只有做得到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有与无的问题，因此很难以此来理解新文科的“新”。甚至可以说，如果将新文科的建设聚焦在跨学科、文理交叉上，实乃了无新意。

也许有人持论，当代的科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有些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今天强调文理交叉具有以往不同的深度与广度。这当然也是对的，而且深度与广

度的推进，也会带来性质的改变。只是，这样的推进足以表证文理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而不足以彰显新文科的“新”，因为这些仍然是以往倡导的延续。

真正厘清新文科的建设理念，不是仅仅重提学科交叉这样的旧话，而应该放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来进行理解。高等教育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已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扩大知识生产与培养人。在这个过程中，同步实现社会服务与文化遗产。可以说，知识生产与培养人既是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内容，又是推进与提升高校发展的真正动力。与此相应，包括文科在内的所有学科则是知识生产与培养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知识分类形态。这种知识的分类形态，即学科，一经形成，便毫无疑问地影响甚至左右着知识的生产与人的培养。只是，这种影响甚至左右原本是正常的，而且也并不可怕，因为知识生产与人的培养的内在要求会以问题为导向，不断突破既有的学科边界，并迫使学科作出相应的调整，跨学科交叉与文理交叉就是这种调整的具体实现。换言之，学科交叉是知识生产与培养人的结果，虽然一旦型塑成新的跨学科，新的学科会强有力地影响后续的知识生产与人的培养，但知识生产与培养人是根本的内在动力。

由此出发，新文科的建设首先应该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知识生产上寻求知识的增量建设，而不是知识的存量重组。

无论什么知识，首先是对现象世界的认识，文科则是有关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知识系统。我国现代的高等教育与知识体系是20世纪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而从西方植入的，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知识话语，都源自西学。由于自然科学的对

象是一致的，因此这样的西学植入具有它的普遍性与有效性；但对于文科而言，由于观察与研究的对象是在历史中演化而成的各具特殊性的人类社群，因此形成的知识话语与系统便自然具有相对性。这样讲，并非全然否定文科的知识具有普遍性。相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文科依循西学而设置，已足以表证文科知识所具有的普遍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历史现象及其复杂性，诚乃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出现过，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日趋推进，中国所呈现出的特色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中国与西方之所异远胜于所同。针对这种现象，源自西方的文科知识话语在认识与分析上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是显见的事实，也是学术界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自身的知识话语的原因。新文科建设的首义应该在此，这是基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要求所呈现出来的。换言之，这是基于知识生产而提出新文科建设的根本性质。

如果这样的理解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么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建设思路也能依此而大致获得认识。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主要应该围绕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来展开。强调中国，并不完全是因为新文科的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所提出的任务，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客观的巨大存在，无论是人口、地域、经济总量，还是制度、文化、历史。在关于人类知识的增量生产上，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其所提供的远非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认识价值，而几乎是一个文明形态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一旦确立，也不只是具有中国性质的地方性知识，而是与源自西方的知识相映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

除了中国这个地理空间外，改革开放的40多年则构成了这一认识的时间维度，而且这个时间维度是向前回溯的，要解释清楚40年，需要回溯新中国成立70年、废除帝制建立共和以来的百余年，甚至到近代开始以及传统中国。简言之，既有的文科知识话语主要是源自西方的经验观察与分析，新文科的建设应该开辟源自中国的经验观

察与分析。改革开放的40多年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对象与切入，实乃这40多年所呈现的中国现象既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巨大转型，又是西方提供的知识所难以解释的。至于还要由这40多年向上回溯，则是因为这40多年所发生的巨变，决非无来由的，而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回溯越是深入，现实的认识越是真切。

毫无疑问，新文科的建设要以中国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以此探索建构中国自身的文科学术话语，并不意味着不看世界，更意味着摈弃既有的源自西学的学术话语。今天的中国早已如梁任公当年所讲，由中国的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国，观察与分析中国现象，必须置于世界的视野中进行，实无须赘言。至于既有的源自西学的学术话语，虽然在解释当代中国时发生困难，但并非全无价值；事实上任何新的学术话语的形成，必然基于已有的知识话语，而难于完全摈弃。只是，新文科的建设要高度自觉地意识到既有的知识话语所存在的有限性，而且这种有限性是由于它的观察与分析对象的限定所造成的，因此当观察与分析中国时，不能拘泥于既有的知识话语，而要探索能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与知识中提炼出新的知识话语。

总之，在世界的视野中重新观察与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进而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充分吸收既有的与不断新出现的西方文科知识话语，提炼出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的知识话语，不仅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科，而且能够贡献于整个学术世界。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且举一例。冷战结束，中国和平崛起，世界秩序面临重构。以西方的知识话语，在表面上动摇甚至放弃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西方提供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然这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理念与事实，更不符合中国的当代价值与利益，和平发展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过程，也是根本诉求，因此西方提供的知识话语显然无法适用于中国，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而这一方案所依托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以及价值理念正是

中华文明所推崇的“和而不同”与“协和万邦”。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植根于中华文明而直面当代中国与世界所提出的新知识话语。

其次，新文科的建设应该重新思考与探索人的培养。人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这个培养在现代社会主要是知识导向的，但也是含有价值取向的。为了更有针对性，这里着重就价值取向来讨论，也就是聚焦于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职能来讨论，因为以价值取向为主要特征的立德树人可以认为是文科相较于理科更重要的职责。

立德树人的着眼点既在“德”，又在“人”。之所以要标示“人”，是为了要与“人才”培养的概念相区别。人才着眼于人的有用性，具有工具性的导向；人则是着眼于人本身。强调这个区别，并不意味着人与人才完全是不相关的，甚至是冲突、对立的；人才可以理解为人人的上位或下位概念，或者别的关系。但是，人与人才的区别仍然是显见的，最核心的区别是在于人才的关注点是在工具性，而着眼于人的关注点在人本身。人就是自足的观念，人是人自身存在的依据。而人作为人自身存在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人赋予自身以内涵，这就是德。立德是人的培养的目标。但是，要明确这个内涵或目标，自然先要有关于人应该具有的德的确认，德的确认也就是人的确认。然而，恰恰这个关于人的确认是很困难的问题，因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构成了有关人的一切知识的永恒主题。不过，虽然在理论的层面给予一个界定显得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诉诸我们的日常经验，当我们听到“你这个人真不是个人！”这样的谴责时，又足以表证在这个吊诡的命题中，人们似乎都有关于人的清晰界定。如果追问下去，一定不难发现，当这个命题出现时，决不是那个人缺乏某种工具性的能力，相反可能是那个人的工具性能力很强，只是那个人缺乏自身所处社群所认同的人所应该拥有的德性。人们可以直观地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但对于德性的界定却往往歧义众生。这自然给人的培养带来挑战。

现代高等教育是建立在知识细分的基础上的，而知识的标准是可以测定的有效性，不是难以界定的德性。工具性导向的人才培养是对有效性原则的贯彻，本身无可厚非。人才本身也是人的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也是居于核心位置的。问题是当工具性导向的人才培养几乎成为高等教育的全部，德性的思考与修习没有相应的位置，其结果便是工具性的追求致使人的功利欲望膨胀。功利欲望自始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动机，本身也无可厚非，只是于今为烈的是，这台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云霄，以至于培养人的大学受其驱动，致力于生产各类有用的人才，以应对社会的需求；而且，作为教育生产链的成品终端，大学的人才生产目标，成功地引导着下游的生产线，使得工具性人才生产的精神获得基础教育，乃至学前教育的高度认同，清晰明白地彰显在“不能输在起跑线”的广告语上。当各类有用的人才奔竞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时，复使发动机更为强劲。然而，发动机不是方向盘，虽足以提供动能，却不能引导方向，引导人类前进方向的还是应该关于德性的思考与培养。

德性的思考与培养，很难属于具体的工具性的专业知识，尽管这些专业知识的学习也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帮助。德性的养成需要人们超越工具性的专业知识，在统合贯通各种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思考与修习人自身。这里所说的统合贯通各种专业知识，并不是在学了各种专业知识之后，而应该是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能够保持另一个统合贯通的维度，它不是指向工具性的，而是统合贯通于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

然而，现代知识的细化已使得古代哲人才能洞见的“知识无涯性”尽显无余地成为现代人的常识，工具性的专业知识学习似乎已完全耗尽了人的精力。如何在工具性的专业训练的同时获得“人”的培养，已溢出专业的教育能力，因此在现在的高等教育中常常寄希望于通识教育。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一方面，即便在相当成熟并已形成某种通识教育传统的欧美大学，通识教育如何应对现代文明仍然是严峻的课题，因为它

的基本理念仍然是人的工具性导向的，而不是人的德性导向的。德性的培养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是由基督教承担的，尽管现代化在西方呈现为去基督教的世俗化，但作为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一功能即便不再是牢固的存在，至少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着有效的转化。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建立于西方知识系统上的，或者说，是与自身传统相脱离了的，这意味着德性的培养传统被抛弃，引入的西方现代化又是与基督教传统相分离的，因此，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实践中，通识教育在性质上虽然是西方式的，但由于失去了德性的维度，其知识的统合贯通便成为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流为专业知识的肤浅拼凑，或者干脆流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宣贯。意识形态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意识形态教育同样应该是深植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厚土壤中的，否则便是悬空了。换言之，我们的高等教育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职能上多少是陷于一种悬空的状态。

由于文科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知识，因此，改变上述这样的悬空状态，就应该是新文科建设重要的内涵；而由上述关于通识教育的举例，则可以进一步表明加强新文科立德树人内涵建设的重要路径，就是要重新接续被近代以降的现代化进程所强行打断了的的中国文化传统。换言之，新文科建设落实到立德树人，其重要的路径应该是致力于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解释与创造性发展。事实上，在这里，立德树人的同时，也就是知识生产，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推陈出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立德树入上彰显新文科建设的中国文化内涵与路径，决不能理解为新文科建设的自我逼仄。在全球化的当代，应该而且必须基于国际化来培养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新文科建设中彰显甚至强化中国文化，完全是一个有所针对的具有历史意味的概念。近代中国开启的现代化转型是以全盘西化为基本导向的，现代化被简单等同于西化，中国文化被视为现代化的负赘，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务须加以革除的。对百多年来的这一现代化探索，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予以否定，认为完全就是错了，因为历史中的探索总是有着自身的必然性，或者至少是某种不

得已；即便这样的探索已证明是完全错了，它也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成为文化的有机部分，而且对于当下的我们，这部分更呈现得清晰而有力，不能作简单否定而陷于某种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在经过了中国文化的自我革命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我们至少不会，也不必继续像前人那样，强烈地要脱胎换骨成为西方人，我们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终究可以是，也应该是中国人的现代化，而不完全是西方的现代化在中国。因此，基于中国文化的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中国意义上的人，但这个中国的人并不是与西方人、或者其它的人不相容的，大家其实都只是住在同一个村庄的不同社群而已。

综上所述，新文科的建设是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背景下提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愿景，有着明确的时代要求，同时又负有深重的历史责任。我们从知识生产与立德树人两个维度简单地作了以上的思考与阐述，通过把重心聚焦在知识生产的现实内容与立德树人的德性培养，彰显新文科建设的性质、内涵与建设思路。显然，这只是一个大的框架与个案式的说明，远不是新文科建设内涵的全面阐述。但是，从这个大的框架与个案式的说明，我们仍然强调它彰显了新文科建设的性质、内涵与建设思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框架与说明对于新文科建设的理解与推进是关键。要而言之，新文科建设要在知识生产与立德树人两个维度上展开：在知识生产的维度上，要直面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现象，在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脉络中，吸收外来知识，给出自己的解释，从而提炼出中国的学术话语；在立德树人的维度上，要能够深刻反思近代以降的以反传统作为前提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基于中国文化来立德树人，通过文化认同，培植文化自信。

（陈 凡，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1121；何 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刊载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新文科的学术范式与集群化

季卫东

一、在理工科强校发展文科的重要意义

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学很容易蜕变成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基地。缺乏社会科学的大学不可能陶冶批判理性，因而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创新。缺乏那种空灵的、思辨的人文社会科学氛围的大学则无从测量“心灵的深度”，难以形成卓越的气质。因此，文科的发展状况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而言，近代化、产业化以来的文科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即：（1）人文艺术，例如语言、经典、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等等；（2）基础性社会科学，例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等；（3）应用性社会科学，例如法律学、经营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等。在既有的理工科强校振兴文科，往往需要明确的战略部署乃至行政推动。众所周知，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思路是以自身的优势为杠杆——“文科的发展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而要培植与工程、科学及数学直接相关的文科”。所以MIT特别注重文理交叉融合的跨学科平台建设，创立了探索信息技术潜力、促进数码人文发展的超级工作室（Hyper Studio）、以深化政策科学研究为目标的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但是，清华大学的思路却有所不同，采取了尽量补短板的木桶学说——“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受制于最短的木板”。于是乎国学院、“清华简”应运而生，并且也成效显著。从新文科概念的角度来看，强调文理交融的前一种思路更富于创造力。

二、文科学术范式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切入点

实际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之下，人类社会的结构以及精神面貌正在不断发生剧烈的变化。通信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虚拟技术，造成了信息和实体的交错融合和数据驱动的经济，整个社会的智慧网络化正在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治理方式的深刻革

命。这就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进行范式创新，打破原有的学科分野，进一步促进文科与理工农医的交叉和融合。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新文科并不是在原有的文科中添加一些新兴技术，而必须塑造一套新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并且推动实质性学科交叉、真正进行跨界协同的复合型研究、进而创设新的学术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新文科的基本特征是问题导向，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密切合作以及对未来的进行创造性构想。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文科强调的不再是功能分化，而是机制整合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串联和互动关系。因此，新文科势必会呈现出那种所谓卓越集群（Excellent Cluster）的形态，来自不同学院和学科的研究者为攻克重大问题而在一个多元框架下聚集、组合在一起进行打破既有樊篱的尝试和协作。

在新文科的视野里讨论上海交通大学的人文社会发展途径，我认为不妨在社会理工学领域寻找突破口和制高点。例如在理工科院系集结研究者团队与文科院系合作，采取实验、实证、模型、模拟、数理分析、数据驱动等方法，从社会系统工程和行为科学的角度研究价值、网络、管理、风险以及最优化决策。应该鼓励采取系统思考方法，在不同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组合方式中发现、考察、认识、理解、分析、解决、评价各种社会问题，找出系统的最佳组成方式以及最有效率的运营方法和机制，建立包括博弈在内的不同模型并用以模拟、设计、管理、预测以及优化。应该鼓励借助神经认知科学方法（Neurocognitive Approaches）从事行动经济学、行动政治学、行为法学的研究和教育。还应该促进以“巧用技术的技术”为特征的经营工程学的成立，并注重科技和企业经营的ELSA（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Aspects）问题的探讨。为此，有必要建立若干个校级文理交叉融合的跨院系卓越集群。例如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就试图通过方法论和理论的创新，确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法治社会理工学体系（Science, Social

Engineering and Legal Ordering, 简称SSELO或法治科学) ”——即分别从法律实施系统、社会行为系统、社会价值系统、社会沟通系统等不同维度考察、实验以及论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机制,并在计算社会科学和数字法治的基础上建构关于法治社会的学术命题群以及理论范式。

三、新文科驱动的两轮: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物联网形成大数据、各类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的发达和普及,使文理交融的科学研究正在转向数据密集型的“第四范式”,引起计算社会科学的勃兴。所谓计算社会科学,是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分析、多媒体技术、区块链技术、机器学习、复杂性建模、模型识别、社会仿真实验等新兴方法支撑下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和行为识别而形成的新型跨学科领域。海量数据、数据全集乃至完全数据的采用,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持系统的形成,给社会科学研究开拓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人们将更多地通过数据来发现和认识问题,通过解读和分析数据包含的信息来做出判断。如果说数据是还没有进行评价的素材,那么信息就是在特定场景里进行评价后给选择和决策提供的参考资料。信息的普遍化形态就是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特别关注的是采取名义尺度、排序尺度、间隔尺度、比率尺度等进行编码的数据,因为这样的数据可以为判断和决定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有利于系统思考方法以及社会系统工程学的发展。

庞大而复杂的数据处理、分析、应用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在这里,数据的规模和质量与人工智能的存在非常显著的正比例关系:大数据越多、越好,行为履历和数字化档案就越丰富,因而人工智能的预测能力也就越强、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也就越广阔。由于我国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大数据的收集和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理所当然具有非常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也注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受到人工智能更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算法黑箱化与问责原则之间的冲突,并且不得不正视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效率、理性、公平、人道等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从文科与理工科交叉融合的视角来看,协同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可说明的(explainable)人工智能(EAI)”、“可信赖的(trustworthy)人工智能(TAI)以及避免“算法独裁

(Algocracy)” (John Danaher的表述)。但是,自然形成的数字鸿沟势必带来政治上的代表性偏差,巨大的电商平台势必改变经济上的市场竞争机制,遗传信息的利用很可能复活血缘和身份的社会定位机制,对带有偏误的既有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很可能导致算法歧视、系统偏误的维持以及网络人的阶层固化。另外,在法治层面,人工智能作为规则嵌入系统可以实现一种貌似非强制的行为控制和社会控制;以深度学习和智能网络化为背景,原则上的人对自动决定过程的监督和介入也不得不以人工智能来替代,最终出现以人工智能监控人工智能的叠床架屋事态乃至人类失控。

四、透过区块链和网络来思考价值取向问题

上述这一切都意味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将很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近代化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价值取向以及研究方法,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制度设计。鉴于智能网络化的现实,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2018年实施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承认个人享有对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档案提出异议的权利,规定如果数据管理者不能出示充分的正当性根据和履行说明义务,就必须中止电脑系统的处理。这个欧盟规范还承认数据主体有权不服从那种仅仅根据人工智能而自动化做出的决定,并明确指出数据管理者不得通过假装有人介入和监控的方式来规避这项“人工智能时代的抵抗权”。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强大的隐私权会分割数据-虚拟空间、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探索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宪法观的主张也迟早会被提上政治议事日程。具有经济价值、甚至被视为通货的数据应该私有还是公有也会成为法学的重大争论点。在这种场合,个体尊严、隐私权、选择自由以及民主参与机会也许需要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实现和保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区块技术来制衡智能技术,捍卫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精神。此外,在机器人的功能与人类能力相匹敌时,在人机混合状态日益普遍化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例如复制人出现)时,在人工智能开始具有一定程度自我意识乃至精神作用(特别是高仿真智能人出现)时,机器觉醒后的法律人格和人权的讨论也将带有现实意义。

“互联网+”导致全球网络化。5G移动通信系

统进一步促进了万物互联互通和网络的智能化。从1990年代开始，以社会学通过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实验发现“小世界现象（small world phenomena）”为契机，诞生了网络科学（science of network），过去难以描述和解释的一些物理现象、化学反应、物种谱系、脑神经结构、传染病扩散途径、社会组织原理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这个共同概念来理解和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成为新文科的重要领域之一。网络是互相联结的节点的集合物，并使社会关系的位置具有不同的距离。每个节点既是结网的中心点，也是网络结构的转换点，后者的本质是注重节点在整体结构中的功能。因此，决定节点动向的逻辑与其说是命令毋宁说是协调；网络只要能不断产生新的节点和相应的联结，就构成动态的开放结构。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网络意味着契约关系、通过沟通达成共识的结合方式以及交易的组织化方式；网络具有双向性或者双务性，势必助长关于主观间性的思维方式；网络会导致边界模糊，因而也具有无序化的风险。一般而言，网络的本质是跨界和复杂性。因此，从网络的角度来看，在文理交融基础上形成的新文科不可能是冷冰冰的机械论或决定论的，相反要从非线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视角来认识自然界，在奇特现象和演变趋势的层面把握客观规律，拒绝那种单纯系统的分析方法和还原主义立场。

五、新文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文科主要以人或者人际关系为研究对象，需要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具体语境、价值涵义以及历史演变过程来把握知识的内容。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真理以及判断必须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其他主体之间的可变性关系中来把握，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相对性、流动性，因而其知识体系必须具有更大的包容力。在这里，学术的本质是发现或者邂逅未知对象，与之进行对话，进而通过实证和诠释不断推动话语体系的自我更新或者革命。通过与他者的交流而实现相互理解，在基于逻辑推理的反驳和商谈中进行知识创新，并通过涵义的解释达成共识。在这样的视野里，任何词汇、概念、命题、理论以及逻辑都不是绝对的，研究方法也更具有动态性，强调怀疑、反思以及批判。简而言之，什么

都有，但并非有什么都行——这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性和竞争力的本质性条件。

新文科的学术活动更是不得不以复数的甚至迥异的记述体系为前提，因此必须鼓励思想、意见以及方法之间的竞争，并反复探讨正当化论证的适当理由。实际上，新文科研究的乐趣也恰好就在这样多层多样的话语空间以及沟通行为的开放性之中。新文科知识体系的真谛可以理解为在主观与主观互相碰撞和博弈过程中话语的因势利导，主要通过一系列批判思维、论证性对话、基于推理的沟通活动来达成共识。另外，根据中国核心价值体系重构的需要，应该加强文史哲学科的创新，尤其是注重哲学思想以及批判社会理论的探讨。在对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两百年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制、一百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经济模式以及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分析以及反思的基础上，有必要结合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重新诠释“亚洲价值”，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能用人类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和提供新知识、新思想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家，并通过整合资源的方式创办高质量的国际教育项目。

从新文科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开发适合中国条件的博雅教育模式和通识课程设置，现阶段的授课内容不妨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特色，并且推动数字人文的发展。为了适应文理交叉融合、进行复合型研究以及创建新学科的需要，还可以考虑进行教学体制改革，采取双导师、辅修专业等多样化举措，在研究生阶段培养文科与理工科双学位的学术型人才。当务之急是扩大选修课的数量和履修自由度，尽量开设跨学科和多学科性质的选修课，拓展学生的视野和跨界能力。政策科学类的选修课以及“解决问题工作坊”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洞察力、表达力以及操作技能。应该把“研讨班（演习班）制度”正式导入文科教育现场，普及对话式教学方法。还应鼓励学生自由组成读书小组和兴趣小组，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上海 200240）

（原文刊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新文科建设的三个理论前提

王 永

“新文科”建设是当前高校推进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2018年10月18日，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计划2.0的意见》，《意见》在原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理学、哲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提出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改革任务。一年以来，新文科建设在实践层面上积累起初步的经验，新文科建设对整个传统文科的“迭代”效应正在慢慢展开。“新文科”的概念内涵和实践进路正处在一个理论生成和模式探索的关键时期。理论界应当从人文学科的最终目的出发，结合当前各个领域的前沿变化，深入探讨对一些基本前提的理解，才能在建设实践中真正达到学科创新的水平和要求。“文科”这一概念有两重应用场域。一是“科学”划分的场域，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文科内涵上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外延上与自然科学相区别。二是“学科”划分的场域，文科是人文学科的简称，是高校中以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为主干，延伸到艺术学、新闻学、传播学等新兴学科的现代学科体系。“文科”的“科学”与“学科”这两重概念场域涉及到高校科研和教学的双重属性，基于“新文科”本身的学科命意，本文所使用的“文科”的概念定义，在顾及二者区分的前提下主要还是着眼于后者，也就是“学科”的立场。

一、新文科与新科技的关系问题

人类知识的建构源自于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践体验与经验积累，当前自然科学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在加速进步，而且深度扩展到了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此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反应与回应。新文科的建设，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然与人文对话的新背景条件下被

提出来的。着眼于对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的承载和推动，新文科建设应该扎稳脚跟，借助新技术突破固有学科难题、攻关新课题，还原新技术的工具属性，抓住新产业提供的契机，形成学科人才良性通道。

（一）新文科要有立足于自身的问题意识

新技术给当下文科发展带来的帮助主要是文献方面的丰富、便捷和数据统计分析的量化支撑。一方面，文献、文物的数字化、数据化是科技进步为文科发展提供的有力辅助，为解决传统人文难题提供了新的手段。另一方面，由新技术带来的量化图表、数字地图、关系网络等可视化、智能化分析工具和方法对文科一些新的分支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前者以“籍合网”为代表，不同于此前《四库全书》等古籍全集的数字化成果，“籍合网”提供的是中华书局古籍整理文献成果的数据化服务，使传统学术的研究得到更加便捷和智能的辅助。后者以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主持的 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等系列数字人文成果为代表。遗憾的是，无论是古籍数据化还是时空关系可视化，都还没有被人文科学研究者充分运用，也没能正面回答人文科学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国内，诸多衍生成果也还停留在“炫技”的阶段，没有发挥出工具创新应有的震撼性力量。

新技术条件下，在这些越来越规整的材料和高效的处理工具背后，文科的问题还是应该回到人的自身这个原点来寻找。处在弱势的人文科学，尤其要回到个体自身意识上来寻找文科的基本命题。因此，利用新科技的成果，对作家或形象的数据文献进行自我分析，并贯通到对数字化时代个体自我表达数据的综合分析，是人文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立足点。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精英与大众的二重对立，被消解在对个体的尊严与价值的寻求中，我们只有从个体意识的角度回溯

学术史，才能唤起置身当下的问题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数据库检索的统计学和可视化，应是在对文科基本问题提问后的求索与作答。要强调的一点是，人文科学的短板正是人类文明的短板，人文科学的进步将会推动人类文明的平衡。落实到学科建设，新文科建设中要注重培养文科学生对科学方法包括数字化工具的运用能力，使其在深入探究学科学术史的过程中，能够灵活恰当地运用相关工具手段进行检索、分析、处理、研究，甚至提出新的算法、模型以及编程改造方案来解决专业需面对的问题，从而获得本学科研究上的突破，这是人文向科技结合的自身愿景。新文科建设的目的是以学科建设的方式，在人文科学的新起点上真正建立起科学范式，超越传统人文研究过度依赖新见文献、权威观点和个人悟性的历史阶段。围绕着人的研究，新文科建设要特别关注当代科学对人自身的研究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科学方法，在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时候要保持学科本位的立场，既不能随意搬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无谓地衍生分支，也不能丢掉自己的本行只去被动为其他学科服务。

（二）新文科要不断重申技术的工具属性

在自然科学取得飞跃式发展，不断突破其原有工具属性，甚至具备了自身“理性”“情感”等“智能”属性的当下，诸多前沿科技给人类精神领域带来了深重的恐慌甚至悲观。的确，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整个关系发展历程来看，经历长期的协从发展之后，二者如今已进入一个高度紧张的博弈状态。我们首先要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对滞后，人类文明的舞台只有一个，在急速变化的时刻，人文科学的失语和社会科学的失位，更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出场。如北京大学王博教授所说：“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相对于人文学科的存在感更加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学科特点决定的。但基于反思的立场，人文学科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被科学技术改变的世界，关心变化的中国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不应该因相对落寞而沮丧，应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在与自然科学对话

的被动关系中，不排除有一个全社会的理论认知偏差的现象性原因，在自然科学的勇敢担当背后被忽略的也有自然科学的无力和局限。实际上当下很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原因在于人，解决之道也在于人，人文社会科学不能缺席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

个别数字人文领域的学术论文已经开始使用第二人称“他（她）”来替代“它”去指称其所推崇的智能科技，笔者并不认同这种用法。在人的信仰和本能之外，工具作为直接连接人与自然的桥梁不断发展与升级，甚至人类文明的阶段划分即以工具的颠覆为依据。不可否认，作为高级阶段的工具——科技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带来了不断强化的危机与愈发复杂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文学艺术创作及其学术批评作为意识形态的忧患意识和自省精神，又强化了机器智能的威慑态势。以艺术为例，我们检数一下反映人工智能题材的电影作品，这种对机器的“拟人”化修辞与叙事，大部分是基于一种落后的“渔猎思维”的模式。当追问这种叙事模式为何会被商业资本推动时，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人自身对高级文明中变异个体的不信任以及对工具发展的终极恐慌。所以，只要我们解决了这种恐慌和不信任，抽掉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中落后叙事的受众根基，人工智能的威胁就会得到缓解，智能机器的工具属性也就还原出来了。这种化解，需要依托文学和艺术对机器“人格”的精神重建来实现，也需要大众普遍的人文自律和文明自觉。

回到现实层面来看，个体的人在面对集成式智能机器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失败。这里有个体与集体的不对等对抗关系，也有被掩盖了的集成机器胜利背后依然是人的集体胜利这个本质。从吸取科技发展长处的角度思考，我们总结新科技之所以产生飞跃式进步的原因，会发现这与科技人员的团队式、协作式工作模式以及科技成果的集合式、积累式发展方式有重要关系。当前文科滞后的原因主要是离开了人文精神合理的传承创新机制，无法形成学科底蕴与学术合力，无法在前沿尖端问题上发挥出直观的学科力量。

新文科的发展，也必须将自身的传承式、学派式、集成式传统充分发挥出来，把个体的原创能力更好地承载起来，才能在机器无法企及的情感丰度、思维深度和创新速度上发挥出学科优势，保持面对工具挑战的从容余地。新文科建设需要不断以实际行动重申科技服务于人类的工具属性，新文科须以此为基础思考、革新、建构自身的知识和专业素养培养体系。如何集合积极健康的文化元素，通过成体系的人文教育落实到新一代人才的文化素养上，是新文科教育成败的关键。

（三）新文科是信息时代产业变革中的学科自新

新文科之新，尽管涉及到诸多维度，但直接的激发动因还是人文学科的边缘化、萎缩化，以及与之存在共时关系的新技术的飞跃发展和新产业的急剧变革。基于新科技和新产业带来的招生和就业危机，美国希拉姆学院也曾提出过“新文科”这一概念。自2018年10月开始，希拉姆学院全面修订了培养方案，对29个专业进行重组。从课程建设上看，“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建设反映出文科教育的一些全球性、普遍性危机问题，很明确地加强了人文学科教育的信息技术含量，在做法上对我们深有启发，但笔者不同意将我国教育部门提出的“新文科”概念溯源到希拉姆学院的学科改革。我国的新文科是在新工科等一系列学科变革的思路下应运而生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我国新文科建设在学科基础、学科特色、学科使命等方面与希拉姆学院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当然，正如希拉姆学院新文科建设计划提示我们的，新文科之“新”，既是对长期以来文科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进行回答的必然选择，也是回应新产业挑战的学科自新。回顾文科的发展历程，百家腾跃的战国诸子背后，是诸侯间人才对抗的时代需求；独尊儒术的两汉经学背后，是皇权体系的选材要求；诗赋交谒的盛唐风潮背后，是科举制度的荣身之路。从人才培育的学科视角来看，对现实回报的许诺是难以回避的一个前提。尽管真正的文人往往“背叛”了腐朽

的体制，但体制提供的土壤、框架和边界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还是必不可缺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文科对于人才是不缺乏吸引力的。改革开放之后，在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不能提供相对更加充分就业保障的文科变得缺乏竞争力，这是当前文科危机的现实原因。

在数字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的文明转型关键期，原有的文科生态在土壤和基石层面已经不断贫瘠和瓦解，诸多分支学科的人才体系走向恶化，高校文科的师资力量、课程体系、教育水平已难以面对接受过更好基础教育的新一代学子。现有的培养体系已经显得保守和落伍，不能满足事业、企业对精英人才的要求，更不能满足未来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

不过，信息时代新的产业变革也为文科从业局面的改变带来了新的契机。伴随着新技术革命而来的新媒体、自媒体写作等新业态队伍的壮大等现象也昭示着文科生新的未来，文科生一旦将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新的技术条件与审美潮流结合起来，就会成为社会发展急需人才。新文科建设，应该为新产业的人才及素养需求做好准备，围绕信息技术的强化，在不失学科本位的前提下，做好通才式、跨界式人才的培养，以驾驭各个领域不断爆发的新知识、新变化，应对未来文明的尖端挑战。

二、经典与经典之学的更新问题

经典的缺席、经典之学的混乱，是新文科建设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回顾人文教育的本土发展历程，经书的确立一直是重要的话题。王阳明在《尊经阁记》中说：“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既然无有邪慝，那么人文化成之道自然已经实现。我们检视当下，会非常明显地注意到经典的危机与社会上的诸多现实问题存在着共生关系，而解决的根本之道，正在于经典的重新树立与经典之学的与时俱进。“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

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这段话对当前的经典之学也很有针砭作用，乱经、侮经、贼经，正中当下经典之学的时弊。经典的认知深度与普及广度是人文学科立足之本。

（一）经典的与时俱进是新文科建设一项核心任务

经典所承载的，是“道”，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根本共识。人类文化的大部分经典文献都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对于这种现象的生成原因有不同角度的解释，但是，前经典时期漫长的口传文明积淀固化为文字载体的书面文献，是经典内涵如此丰厚的重要内在原因。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生成历程来看，晚周已有“六经”之说，汉代则确立五经，后又将经书范畴扩展到“三礼”“三传”以及《孝经》《尔雅》，宋元以后又增加了《论语》《孟子》，这是经典内涵不断扩容的历程。经典还有一个自我更新的历程，如宋元时期推崇起来的“四书”，都是儒家学者从先秦已有核心典籍中选取升格而成的，这种更新在一定时期内强化了儒家经典的现实意义，更大程度地发挥了经典的潜在价值。在这条儒家经典发展主线之外，尚有子学经典和宗教经典的副线补充。建国以后，马列原著取代了儒家典籍而担当起核心经典的地位，也发挥着时代性的历史作用。

尽管“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大众文化底色会导致对经典意义一定程度的质疑，但就人类社会当前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经典的存在依然不可或缺。新文科建设能否在古今中外经典著述的基础上，以新的眼光重新论证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范畴，是能否迅速进入轨道的前提。新文科的经典生成应有多方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经典之学的理论升华，可以作为还原式经典提取的学术框架。流行的大众文化产品中也已经蕴含了丰富的创新元素，注重生存、繁育、健康、美丽、富有、快乐、亲情、正义、幸运等生命主题的个体表达与注重使命主题的社会表达构成双层呼应。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等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西方的视阈。综

上，传统、官方、民间、外来的不同选择给新文科的经典确立提供了宝贵的参照意见。新经典也存在着自我培育的机制建设问题，新文科的跨学科、通才式教育，恰是人文腾跃准备阶段的必要前提。对新文科教育来说，如何建立一个在文科学科群和不同学历层均适用的经典教育体系，是一个需要积极探索的实践问题。

（二）经典之学应该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反思与超越

仅有经典还不足以完全发挥经典的价值，还需要经典之学的桥梁作用。学术文化的良性建构是新文科学科建设对接人文社会科学使命的桥梁。以本土的经验来说，可以通过对国学这一概念的辨析入手进行讨论。“国学”常常被理解为知识层面的传统文化遗产，实际上，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这个定义浓缩了章太炎、张岱年等国学名家的一致看法。按此定义来说，传统学术文化才是国学的核心。在网络时代，重新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国学视野下传统文化并不是汗漫无边、良莠难辨的“信息”，而是以经学为核心的经典之学，这样的国学定义及内涵则显得更加精要与集中。传统的经典传承方法包括传、注、疏、证、笺、解、考、评等研读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会、集、编、选等传承方法，丰富多彩，这些学术传统对于我们发展多元化学术形式很有启发意义。经学以及受其影响的传统学术在治学方法和著述形式上总体是统一的，需要从著述形式入手还原其可操作的学术方法。对于文科来说，多元表达形式应从“论文”这种当代单一的学术表达形式下解放开来。对于传统文科来说，当下便于检索的“论文”形式更多地体现出数字化时代对传统人文成果的归档意义，新时代表文科成果应该具有多元的活力空间。

从中国古代经学的传统来看，汉儒长于训诂，自宋代起已经从“我注六经”发展到“六经注我”，由训诂之学发展为义理之学，而清人又以朴学之风清除宋儒过度发挥之处并深化考据之学，这些都包含着具有价值的学术传统。当然，我们也须从本质上认清传统学术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唯圣哲论以至于不乏牵强曲解之处、独尊定性

研究以至于不乏主观武断之处。当下应以人民性、批判性为立场，理性集成传统的经典之学，强化逻辑论证和量化支撑。清代学术朴学余风值得借鉴，但因此便将一切对人生、对现实的观照都看作是业余之学，将文本的阐释、分析看作是低端之学，也是传统文科的学术弊端。学者的专业研究固然应该高于读者的审美体验，但是学术研究背后一定要有人文关怀和历史眼光。

（三）经典与经典之学的关系是本末关系，不容倒置

经典是人性升华的路径，经典包含的不仅仅是圣哲信仰，也有民间理想，重要的是基于准确的阐释和启示性的传播给予读者自我体验、关联的空间。正如苏轼《中庸论》（中）云：“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现有文科已经“剥夺”了普通读者及边缘学术地带直面经典的“权力”。新文科建设是要在复归人本立场和吸纳科学方法的前提下重回经典，建立一个聚焦经典研究的科学研究系统，找回经典的现实关联和文化功能。

我们强调经典之学的开拓创新，同时也要强调经典这个学术根基。以现代文科教育下中文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为例，百年来逐渐强调文学史而忽视文学原典教学，这是需要纠偏的，正如长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老师所说：“不能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这是经典与经典之学合理关系的正论。

百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价值确实在于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以文体形式、发展兴衰、共时关系三个维度相结合的思路完成的文学史的秩序化梳理，是现代文科的一种标志性成果范式。但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现有的文学史研究较多地掺杂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因素，从不同文体的发展生态和文学创作的展开空间来看，那条纵贯古今的时间线索带有很强的人为建构色彩。这是文学史研究本身的局限。从教学的角度

来看，一部“完整”的文学史已经形成一个闭合的体系，不再相关于新时代的人文需求，新一代学子停留在这种历史维度的“还原—建构—还原”往复操作式研究已经难有重大突破，而且也难以激发本科阶段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参与意识。因此，新文科应该首先“悬置”传统文科所积累起来的琐屑成果，直面经典，在文史研究已经形成的基础文献成果基础上，以经典为核心，辐射到经典背后作家和人物精神生态、阅读视野、时事刺激和表达形式，重建经典与当下的关联，保持方法论上的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寻找到学科自我超越的广阔道路。

三、新思潮与新表达的生成问题

传统文科在不同时期已经完成了理论发展和思想传播的使命，新文科注定伴随着新思想的创生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是在对社会变革与哲学社会科学辩证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得出的科学论断。科技进步所提供的关于人类自身的认知深化在加速消解传统人文成果的价值，深刻改变了人类文化行为的数字信息技术要求文科以融合创变迎接未来。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的新思想的产生是必然发生也是生死攸关的，中国学术、中国学派应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新文科要重新确立“道”与“文”的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首列“原道”篇，唐宋古文家力行“文以明道”的主张，理学家倡导“文以载道”的观点，可见“道”“文”关系是文科学科属性探讨中的重要范畴。历史性地回顾这对范畴的关系史，可以看到新思潮与新表达之间的密切关系。新思潮总是能促动文学艺术表达的变化，而文学表达对思潮演进也有反作用。前者可

以道、儒、释思想融汇背景下玄学对晋宋时期文坛的涵养为例，后者可以元明时期戏曲小说繁荣对心学发展的刺激为例。思想史上，意识形态的维护对象呈现出由天子、国家向社会、人民的下行走向。在今天，伴随着国际形势的相对稳定以及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意识形态领域已处在由社会责任向人民立场进一步偏移的历史阶段，尽管进程还有波折，但总体方向不会逆转。这样看来，新思潮的变化，一定会在大众文化层面率先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思潮的表达方式不是审思的、论证式的，而是直觉的、审美式的，故而，对新思潮的关注和概括也就不能固守于传统的文本形式和提取手段。

新文科所面对的大众媒体环境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思想和表达的关系，提升对表达的重视。从文科的既定传统来看，在思想和表达这对组合关系上，当然是以思想为起点，以表达为终点。然而互联网已经打开了自媒体的渠道，表达的权力和热情已经从政治、经济的束缚下被解放出来，思考的表达交汇已经使思考的思辨交汇追赶不及。所以立足于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主体思考的意义，以批判的立场号召大众重回慎思明辨的理性之中，明确这是所有表达的源头活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要同样注重发挥表达对思想的促进和传播作用。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数字传媒在新思潮生成过程中有着更深的参与度，已经成为民间意识形态表达不可忽视的话语载体。高校文科在大学阶段提供着眼大众传媒的各种形式、各种场合的持续性表达训练，也是新文科应有的内容。新文科的人才尤其应该关注基于大众表达的大众思潮研究，敏感地、理性地关注、参与新思潮的成长。

（二）新文科要建立起与新媒介相适应的“大表达观”

从文化传播的实际历程来看，基于作者的接力性和文本的变动性，我们不得不以“大作者观”和“大文本观”来涵容其间复杂的问题，以保持对原貌的精确把握。着眼于灵活的传播方式和多元的传播媒介，我们也不能不提出“大表达观”来打开原有“文体”和“著述”形式的视野

局限。广义的“表达”研究与实践，可以成为新文科建设的有效路径。

自有文字之后，语言文字的交际功能与审美功能从来都是口头与书面并行，并且与音乐、绘画乃至表演艺术多方结合，但传统的表达观多注重文字层面而忽视口头层面，注重文学层面而轻视艺术层面。实际上不仅具有大众传播优势的语体表达传统值得开发，在数字艺术蓬勃发展的当下，文字、文学与视听艺术的配合乃至深度结合，甚至是与数据统计和编程技术的算法的结合，也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表达现象，这就是新文科应倡导的“大表达观”。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表达不应是文科立场上“表达”的全部，表达问题应该上升到一种哲学、美学的高度来探讨，对机器表达的命题也应该及时研究并给予人文审视。新文科需要与大表达观对接，才能具备更加宽广的视阈。“表达”本身具有可研究的形式材料，合于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利于展开多学科交叉式研究。

实际上，如果说传统文科中哲学是背后推手，那么“大表达观”的研究和实践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传播学对于文学等学科自我超越的再次助推。新时代的表达研究将在传播学理论、文体学框架、个体意识视角三者的结合中展开。基于表达形式的人文科学研究，我们能够提出的命题包括：包含语体、文体、著述体式、媒介方式、技艺形式等，我们能展开多少表达方式和表达场合？意识与表达是怎样一种内外关系？表达者的自我表达与代言表达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无时不在的表达是否存在完整的发出与接收关系？表达的效果和功能该如何评估？等等。广义的表达研究打开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内涵和场景差异，从形式上着手解放了被历史、社会淹没的个体精神。

（三）新文科要倡导中文系对创作能力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教育系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①，对于高校来说，学生和家长就是教育系统面对的“人民”对象。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量中文系学生怀着作家梦来到大学，但是既有学科并未尊重他们的意愿。我们常在大学中文系入学教育中听到一种权威的声音：中文系不

培养作家，与之相唱和的声音是：作家不需要科班出身。可是作家刘震云曾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周年庆典上说过这样的话：“从我进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天起，每一个老师都告诉我，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有愧于老师的教诲。但是我想说的是，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是一个作家上不上北大中文系，对于他的路能走多远，那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中文系的确不必以培养作家为职责，而且培养作家也不一定限于中文系，但中文系乃至整个文科专业不能不重视创作能力的培养。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从培养创作能力的角度看，中文系应该给予的是什么？中文学科在既有体制下已经形成了重学术、轻创作甚至绝大部分教师并不创作现状，但我们并不需要因此而悲观或者反对创作能力的培养，事实上中文系教师在长期科研工作中形成的鉴赏能力和学术眼光正是未来作家在创作起点上所需要的。尽管对于任何一个作者来说，创作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来自持续的表达训练，但中文系毕业生区别于非专业、非学历体系下培养起来的写作者的地方应该在于文学表达中的伦理素养和审美水平，这是大学文科教师必须及时给予的。反过来说，高水平的文艺作品也一定包含着高出群伦的认知，一代有良知、有眼光的写作群体对新意识形态发展传播的意义不可估量。具体来说，笔者希望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代表的文科学生在写作训练上得到更多的倡导和督促，也希望教师和作家给予更为积极、负责的指导和关怀。一个时代中文人才的写作能力，决定着个体视角下的时代记录、记忆、升华与传播水平，其“美刺”功能对于社会发展来说会形成一种先导式的宏亮声音，相对于民间表达的随意、艺术表达浓重的商业色彩来说，高素养中文群体的文学表达是更值得信赖的文明进步推动力量。

四、结语

新文科建设已在各个高校渐次启动，在此之际进行理论建构与模型操作的意义十分重要，未经深入论证而直接进入专业、课程、师资、教材

等方面的规划是不理智的。新文科建设首先要理清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关系，立足于文科的学科基石，以跨界式、兼通式文科人才培养为目标，把握新一次信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全新成果，抓住解决文科固有问题的时代契机。新文科建设也不能回避新科技的优势与挑战，要致力于努力确证科技对于人类的工具属性，尤其不能卷入科技发展自身的对冲和循环中。新文科建设要认清新兴科技手段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和局限，找到并结合新兴科技与新业态相结合后的人才需求走向。新文科要加强传统文科的科技通识教育，但并不应过度鼓励新建交叉学科，不重视专业基础、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利于人才的长线培养，最终会事与愿违。

新文科应重视文科的经典意识，以经典传承创新的跨越式发展作为学科发展引擎探讨经典与经典之学的更新原则，回答如何面对经典、谁来择定经典、如何阐发和传播经典等问题。新时代的文科经典应该具有更加深广的视野，更具有人文情怀。新文科培育下的人文科学，也应该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人民立场、个体意识，在基本方法上注重文献学与统计学结合的深层推进，真正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范式。信息时代、数字文明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呼唤新思想的产生。新文科建设更要观察和思考如何加速意识形态的言说方式创新和文体形式创新问题，研究者应及时关注大众文化的思潮变迁，在“大表达观”的视野下，拓展人类生存的话语空间，以“表达”的演进促动人的自我发展。

笔者希望关于新文科起步的这些理论话题能够引起更多基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的广泛讨论，不断深化认识并增加共识，明确新文科建设不是例行“教改”而是学科创新。文科从业者应该把新文科建设当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遇与使命来看待。

（王永，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新文科建设研究平台执行主任，北京 100024）

（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跨越边界的思考：

新文科视角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探索

王震宇 薛妍燕 邓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其中，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山东大学校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樊丽明进一步指出，“新文科”之新，重在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发展。《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进一步提出，“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术发展。”文科实验室成为引入新技术和促进交叉融合的关键载体。如何以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为抓手，更好地探索新文科与新技术的融合方式，是当下我国新文科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新文科建设路径的探索正是对知识生产体系变迁和学术研究范式转换的回应，新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则位于这一轮融合革命的“震中”。从近代开始，知识生产体系以分化性为基础，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各类学科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尊重学科差异也成为现代大学机构设置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20世纪后期开始，分化型知识生产体系逐渐走向融合，跨越边界的合作趋势空前增强。这一体系变迁的动因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的双重变化：在研究对象方面，20世纪后期涌现的信息革命，使得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其创新速度远高于以往的产业革命，导致后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大大超过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蝴蝶效应”成为了普遍现象。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导致基于单一视角的社会科学分析已经难以全面解释社会现

象。在研究工具方面，信息革命也推动了新认知工具的产生，实证方法的建立及其系统化，为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路径提供了强大支撑，使其能够深入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在学术研究范式上，当下的计算社会科学革命则构成了新一波的高潮。2009年，以哈佛大学教授拉泽尔为首，《科学》杂志发表了共同署名文章，标志着“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诞生。计算社会科学的变革性即在于，它以数据驱动和算法驱动改造传统社会科学，建立了基于数据密集型的研究范式。在计算社会科学的指导下，社会科学也开始了数据化和智能化的历程，提出了诸多学科发展理念，包括新计算社会学、计算法学、大数据心理学、计算传播学等。在科研和教育层面，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趋势。

新的研究范式强调将人文社科的问题关怀和理论视野与海量坚实的数据进行结合，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新文科实验室的建设正是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和科研改革的探索性成果。就其实质而言，新文科实验室的目标就是使知识创造、传播和应用的成本最小化。对学者来说，需要通过新文科实验室利用当代技术的先进成果为解决重要、前沿的社会理论问题提供最适合的技术支撑；对学生来说，需要通过新文科实验室提供对多学科知识体系和多场景实践应用的最短成长路径；对机构来说，需要通过新文科实验室创造将科研知识成果转化为技术产品和公共资源的最优孵化环境。

我国有关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的研究有以下三类。一是研究新环境下人文社科实验室的功能定位，认为文科实验室对教育体系改革、新型人才培养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均有重要战略支撑作

用。二是结合发展现状分析反思存在问题，指出人文社科类实验室整体已经开始新一轮的建设与转型，但仍在发展水平上与理工科存在明显差距，在管理观念、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上都存在一定问题。三是探索实验室建设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法，尤其强调具有资源和制度支持的协同共建。这三类研究共同反映了在科研和教育层面，人文社会科学正日益呈现“对策化、跨界化、技术化、国际化”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从全球视野和实际经验出发，系统性研究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路径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的数字化企业，也已有建设支持社会科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相关经验。虽然这些机构名称不一，但在建设理念、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和技术结构上体现出高度共性，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协作上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充分吸收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斯坦福计算社会科学中心、谷歌研究所、圣塔菲研究所等国际一流机构的建设经验，本研究以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了QS2020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的大学、《福布斯》（Forbes）杂志发布的100家顶尖数字企业中的前50名及由欧盟、美国和英国官方与社会基金支持的4家著名的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样本，尝试较为系统地回答建设社会科学实验室至关重要的三个问题：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功能定位和组织特征是什么？社会科学实验室的资源构建和运营机制是什么？支撑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技术体系和工具设施是什么？

二、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与组织特征

（一）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功能定位

按照场域维度的不同，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功能可区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社会科学实验室促进了传统学科的转型升级，并推动了新的跨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社会科学实验室实现了社会科学问题与信息技术方法的叠加，能够为经典和前沿的学术问题提供基于新技术和新范式的研究支持。受到计算社会科学的影响，经典问题如民主、安全、不平等、经

济增长和公共问题，能够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等实证方法得到重新检验，甚至建立新的因果机制，促进理论发展，从而推动了传统学科转型升级。由于其自身的知识异质性，社会科学实验室摆脱了对单一学科的“路径依赖”，具有探索交叉性和复杂性社会议题的知识创造功能。由此，实验室摒弃了“门户之见”，注重被以往学科壁垒限制的交叉性领域，也为共享的研究议程提供了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推动了跨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2. 社会科学实验室具有智库资政、政策模拟和决策辅助的功能。现代智库的功能即在于“出对策、出思想、出声音”，为政府政策研究提供参考，使得学界的知识资源能够嵌入政府权力的运作过程，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优化。而社会科学实验室借助跨学科网络以及精密的计算工具，能够承担政府横向课题，特别是涉及复杂社会系统及行为的重大问题，发挥政策咨询的功能，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从民意调查、政策模拟、政策评估到数字政府、智慧社区、智慧城市建设，社会科学实验室能够整合学界资源，通过数据分析和计量模型增强对治理政策的解释性和预测性，实现公共效益的最大化。在内部结构上，诸多实验室也下设了政策模拟、政策仿真实验室等专业部门，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策咨询领域。

3. 社会科学实验室促进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的多重互动，推动知识“产学研用”的转化进程。这一功能正是奥斯本（Osborne）所强调的协调者角色，即承担社会创新，不断对知识进行创造性传播和应用。根据该类型学，实验室不仅具有创造知识的功能，同时也是将知识产业化、社会化的组织机构。在外界宣传上，诸多实验室机构、研究团体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与公众分享思想、传播知识，同时开展线下教育和推广，包括介绍自身课程、资源、项目和产品，强化了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而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所设立的实验室，也都为非全职聘用的成员提供了制度化参与研发交流的渠道，由此，社会科学实验室彻底突破了高校界限，增加了诸多原先未有的社会和商业职能。

（二）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组织特征

从组织学角度看，社会科学实验室既不同于传统社科研究机构，也与自然科学实验室存在重大差别，在组织边界、组织资源、组织管理等层面，展示出三点独有特征。

1. 在组织边界上，社会科学实验室建立了网络化的知识生产合作关系。作为横向协同机构，实验室削弱了科层制痕迹，使得知识生产从“单位化”向“网络化”转移，即把组织活动和行动者置于动态变化的网络之中，彼此之间建立节点以实现集体行动。具体而言，实验室的网络化体现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模糊化。实验室不仅破除了高校内部学科分化所造成的孤立性，同时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际关联，与外部行动者确立了合作目标，实现资源的双向流动，成为“开放系统”。二是建立了项目制的组织形式。实验室通过为课题项目设立资助金等方式，保障了流动性的人员配置。以圣塔菲研究所为例，其常驻教授、研究员和博士后囊括了20个国家的80多个机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实验室的性质及目标有所侧重，他们的网络关系具有异质性。如MIT媒体实验室就是由设计师、研究人员和发明家组成的社区异质网络。总之，网络化意味着信息/知识资源的分散化、多元化以及人员流动化，组织边界不再局限于静态结构，与大学制度体现出重要区别。

2. 在组织资源上，社会科学实验室依赖于高投入和高性能的技术设施。新的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对软件和硬件设备的条件提出了更高标准，实验室在两方面进行了尝试：一是使用外包形式，借助其他公司的技术工具进行数据处理；二是购买并配置高技术设备。在后一情境中，作为技术集约型组织，实验室建设要求投入大量财力和技术资源，经济成本较高，往往需要学校机构甚至社会力量的支持，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知识生产特征。以普林斯顿大学计算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耗费了巨额投资，购置了三个大型系统集群服务器，这不仅实现了高速度和大批量运算，也为在线和长期数据存储提供了高度共享和快速写入的保障。在软件维度，实验室也购买了诸多

计量软件的永久正规版权。

3. 在组织管理上，社会科学实验室的运作依赖于高度复杂的内部协同分工。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团队规模较小、数量不多，甚至相当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个体能动性，对于分工协作的需求有限。但社会科学实验室的跨地域、跨领域特征，使得合作主体数量空前增加，这也导致了内部管理形式的变化，其组织运作更依赖于分工协作。总体而言，社会科学实验室以知识专业性作为分工基础，主要表现为由社会科学家提出研究问题、数据来源和获取方法，由数据科学家负责开发计算工具和数量模型方面的技术实现，通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社会网络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推动研究进展。

三、资源与运营：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立与运营

立足“资源构成-运营模式”的框架，本研究将进一步阐述建立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三种典型路径，并比较其运作模式。一是由高校建立的跨学科学术合作机构。主要汇聚来自不同专业的机构或学者，共同探讨跨学科研究议题，承担学理范式转换、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功能。二是由企业建立的跨界应用研究院，出资聘请不同领域的机构、专家或研究员，协同挖掘跨界理论在商业价值上的应用。三是社会共建的数据社会科学实验室，资金来源通常为政府拨款或社会基金，其产出更加多样化，包括学术研究、商业应用、资政报告等，是产学研转化的主要载体。

（一）资源构成

资源是任何组织赖以维系的基础，对于社会科学实验室而言，资金、人力和数据这三种资源构成了其有序运作的必要条件。在此，三类实验室显示出了不同的资源构成模式。

1. 差异化的资金来源。高校主导的跨学科机构常由高校常由多个院系共同成立，因此其资金来源于高校直接拨款或联合院系的共同筹款，存在一定审批程序，在资金支出上受到高校理事会的全面监督。相较而言，企业建立的跨界应用研究院自身就属于公司部门，其数额与企业资金状况密切相关。社会共建的实验室则在资金构成上

最为复杂，其资金来自政府拨款、企业赞助、高校募集等多种渠道，同时也受多方监督。

2. 多元化的成员网络。基于高校的跨学科学术合作机构可以称之为“专家性网络”，成员包括来自数据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神经科学等广泛领域的学者，尽管会有讲座沙龙等形式邀请学界外的嘉宾，但核心人员仍然以学者为主，对外部成员的吸纳程度有限。企业建立的跨界应用研究院则不仅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同时更开放学界和社会的深入合作。IBM研究院就建立了与NGO、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等19个机构的合作。多元主体共建的实验室则不强调任何成员身份的主导性，而是以主题小组的形式进行开放合作。

3. 灵活化的数字协作。比较而言，高校建立的实验室通常自身的数据库容量较小，更为侧重对于数据的分析能力和挖掘能力，其所提供的主要是数据处理而非数据生产。与之不同，在数字化时代，企业通常凭借其行业优势地位、独特的算法设计，在其专业领域内吸引了庞大的用户、积攒了海量的数据。如此，企业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自有大数据以及经市场检验的实践经验。而多元主体的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既能获得关于政府、企业和市场的重要数据，也能够进行高级数据分析和应用，在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能力上都占据优势，这也是该类型实验室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的运营模式

结合研究议题、管理机制和产出成果三个维度，各类实验室在运营模式上既显现趋同融合的趋势，同时又各有侧重。

1. 研究议题呈现跨学科、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共同趋势，同时也在问题领域上呈现差异。由高校建立的实验室所研究的议题往往偏重将计算技术方法应用于解决复杂社会科学问题，并通过新兴主题的学术会议推动研究议程更新与研究成果展示。企业研究议题则贴近产业和公益，主要以生产面向用户和社会需求的解决方案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互联网企业开始致力于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或跨界研究，利用平台海量数据探索模拟大范围的人类行为，尝试解决社会科学中长期

存在如因果推断类的问题。社会共建的实验室研究议题更为庞杂，从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与普适计算技术的交互出发，发展到社会生物科学与创新技术应用，尤其注重面向未来的探索性研究。

2. 管理机制上共同趋向开放多元，但程度有所不同。高校建立的实验室仍围绕教学与科研展开，主要转变在于人员隶属和技术引入；而企业则通过项目赞助、顾问聘请和成立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关系，发展与学界的协作管理机制，推动产学深度融合。社会共建的实验室则注重以专项基金的形式，建立起具有社区共同体属性的研究组织，并通过定期的专题会议探讨、最新成果发布以及工作室互访三种机制加强转化。

3. 产出方面向多渠道、多类型的成果模式融合。除了学术出版物外，高校的实验室承担了更多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功能。而企业组建的实验室也开始通过项目计划招募、提供实习、举办竞赛等多渠道承担这一职能，还通过开发各项技术工具、建立数据集、提供企业赞助等形式支持计算社会科学发展的生态系统。社会共建的实验室因与社会和政府机构合作密切，既能将研究成果以技术转让或公司孵化的形式转化，也可以通过策划展览、发布报告和提供政策咨询方式，提高机构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联结了学者、政府和行业决策者，帮助制定面向未来的公共政策和发展规划。

四、技术体系与工具设施

正如物理的理论和模型发展需要越来越庞大而复杂的技术工具，在“新文科”领域，为了有效利用最前沿的信息技术以支持跨学科的研究，现有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也逐渐形成了针对经典人文与社会问题而建设的体系化工具设施。

（一）数据构成

数据资源是好研究的核心，现有实验室的数据来源则主要以项目生产为主。这一类的数据集主要由研究单位下的项目自行建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路易斯安那奴隶阴谋项目（The Louisiana Slave Conspiracies Project），该项目通过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和数字人文的方法，将两次路易斯安那州奴隶叛乱的证词、档案和行为数据以交互式地图的形式进行整理和呈现，以此研究其背

后的社会关系、组织生产和观念传播的问题。在企业的研究机构方面，则以自有数据为主。如京东大数据研究院使用京东的物流消费数据、贝宝的创新实验室所使用的数字金融数据以及网飞研究院使用的用户观看行为数据。除此之外，欧盟统计局、美国人口局、美国联邦统计局等政府单位也向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高校共享了数据。

多样的数据构成反映了社会科学数据采集与使用的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人文或社科类数据大部分是非数值型数据，其通用的工具较少，工作成本也较高；第二，社会科学的问题相较于高度标准化的自然科学更为复杂和主观，产生的数据多为非结构化数据，在跨学科的合作中多需要再结构化；第三，社会科学研究所需数据往往存在隐私问题——尤其是在行为分析或社会健康领域所使用的“微观数据”。

为此，这些研究单位主要通过两种路径予以解决。第一，数据的生产和合作更多依赖于项目合作。如康奈尔大学分析美国国会的“Following the Money”项目，就使用了将国会议员演讲文本和竞选中所获得的政治献金数据进行异构融合，以此来研究利益集团的组织性行为。项目的灵活性有效提高了非标准化的数据生产与合作，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驱动了跨学科乃至跨界的研究与合作。第二，研究单位通过与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来获取敏感数据，并采取申请访问制的形式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有效规避了高校在使用数据上的法律风险，同时也在数据安全的问题上对研究单位的硬件设备与管理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安全数据中心”（Secure Data Center）也成为了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重镇的标配。

（二）成果输出

除了学术机构一般所产出的出版物、课程以及学术论坛等科研成果外，社会科学实验室最重要的特征是向政府、社会和企业输出了具有极强应用性的产品。按照主题，本研究将主要的成果输出类型分为五类进行介绍。

1. 计算社会科学的模型和工具。模型是通过测量抽象出某些数据的属性，并将这些属性表示

为一组符号语句，其中包含对整个陈述适用的逻辑关系。在计算社会科学的范式下，众多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主要成果便是针对社会系统和群体互动行为进行建模。以研究复杂性的圣塔菲研究所为例，建立了包含对人类信号系统、特定空间人口结构下的文化演变以及公共意见与投票行为等复杂社会互动的抽象模型。另一方面，由于模型对数据与有效测量的需求，实验室也发明了新的数据处理和社会测量工具，如芝加哥大学发明的立法影响检测器（Legislative Influence Detector, LID），康奈尔大学发明的针对社交媒体上仇恨言论的检测器。

2. 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与治理。如何设计、部署和管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法律、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鉴于该主题的跨学科、跨边界和高度实践性，社会科学实验室在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成为了中坚力量。哈佛大学的伯克曼·克莱因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牛津互联网研究中心等机构均建立了算法与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与治理的研究项目。还有如腾讯研究院等企业设立的研究单位也将探索新科技给全球经济和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设定为主要的研究目标。在新兴技术的治理问题上，这些研究所基本代表了最前沿的成果。如哈佛伯克曼·克莱因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有原则的人工智能：基于伦理及权利的人工智能原则共识归纳》，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不仅注重用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展示，也注重通过发表年度报告、参与政策制定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出台过程中，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参与起草的《迈向数字伦理》报告就直接影响了法案中涉及基本私隐权及保障个人数据的内容。

3. 数字经济类项目。数字经济包含了信息技术在商业模式和产品中的广泛新应用，这些商业模式和产品正在改变经济和社会互动。因此，围绕数字经济的研究成果也日趋多元：一方面，企业设立的研究院开始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以改善产品与生产，如网飞的研究院通过研究因果推理和准试验来改善数字营销和流媒体服务；另一

方面，高校的研究院则开始设计新一代数字经济产品，如媒体实验室研发了一款可以进行数字货币交易的比特币自动销售机Lit。在“智慧技术+智慧公民=未来经济”的信念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甚至专门搭建了一套包含了定价、交易、多种货币、税收选择和中央银行在内的去中心化新金融体系。

4. 数字治理与公益项目。数字治理强调用重新整合、以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变革指导公共部门改革，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最终实现善治。这一治理范式已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和支持。这一类成果大多由政府支持，重在应用于城市和社区治理，如阿兰图灵研究所的“为了科学与政府的人工智能”（AI for Science and Government, ASG）项目，该项目旨在英国政府关注的优先领域中部署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研究与应用，包括针对城市分析的人工智能规划系统、复杂工程系统、精密医学与卫生、智慧刑事司法系统以及科学用人工智能工具箱等。数字治理还延伸到延伸到全球公共领域，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援建信息基础设施的数字避难所项目（Digital Refuge）以及IBM研究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合作开发的帮助欠发达评估国家发展计划的人工智能，该AI可以帮助专家审查大量文书以保持其政策与规划文件与16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保持一致。

5. 人机交互与社会机器人。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神经科学各自使用不同的方法、范围和评估标准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在整合这些跨学科综合研究基础上，新兴信息技术——尤其是机器人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由此，人机交互和社会机器人的模型与产品成为了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一大重要成果。这一类产出关注在智能物联网时代，机器人将会在更多领域辅助、增强甚至替代人类的行为，通过重点与心理学、工程学和生命科学的跨学科合作，众多实验室研发了聚焦于人机交互的理论框架、智能模型、交互界面和机器产

品。著名的研究机构包括MIT媒体实验室的社区生物技术、伦敦大学学院的人机交互实验室、耶鲁大学的社会机器人中心等。

（三）技术结构

数据集、算力支持、软件工具和平台网站构成了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的基本技术结构。为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分析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谷歌公司的三个典型案例，来介绍社会科学实验室中的技术结构。

表1中三个实验室为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提供了一整套的生产技术体系。首先，三家机构都有供给研究者的专用数据集，伯克利和斯坦福的数据主要来自政府，而谷歌的则主要来自其应用平台产生的数据，这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燃料”；其次，三家机构为建模与大数据计算提供了基于硬件或云服务的算力支持，受资源所限，研究者个人可能需要近几周的时间才能完成数据处理工作，为此，斯坦福整合了学校信息技术部门的资源建立了两个高性能计算集群，伯克利则专门建立了两个分别用于教学和研究的计算实验室，谷歌则通过基于谷歌云的服务满足研究者的计算需求；最后，考虑到社会科学数据的异构性以及研究结果展示与传播的多重可能性，三家均提供了方便研究者采集数据、训练模型和展示成果的软件工具，两所学校尤其重视数据可视化的支持，而谷歌所提供的则是目前主流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软件。

表1 典型社会科学实验室技术结构表

| 单位 | 专用数据集 | 算力支持 | 软件工具 |
|------------------------|--------------------------------------------------------------|---------------------------------------|----------------------------------------------------|
| 斯坦福社会计算中心 | 全美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数据、欧盟统计局微数据、联邦统计局研究中心非公开人口普查微数据 | 创建了FarmShare 和 Sherlock 两个分层的共享计算环境系统 | 数据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问卷调查软件和人类被试池 |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D-lab | UC DATA 和 Berkeley FSRDC, 链接美国人口普查局、加州联邦统计局以及校际政治和社会研究联盟数据档案 | 提供两个计算实验室, 一个用于教学, 一个用于研究生自由使用 | 通过在线开放的课程提供, 包括数据科学、数据可视化、数字人文、定量方法、定性方法、GIS 与空间分析 |
| 谷歌研究 (Google research) | 谷歌开源数据集, 包含维基百科、油管、谷歌图片等平台的视觉、语音和语料数据 | 提供基于谷歌云的加速运算和模型训练服务 | 提供了目前训练开发 AI 和机器学习模型的主流软件 |

典型的技术结构反映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平台化特征，即通过建设由数字技术支持的基础设施来协调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科学实验室中，

研究者的研究流程转变为“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结果产出”三个部分。实验室作为平台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专属的数据集、计算支持和软件工具，从而使研究者不需要以个人或以团队方式跨院系或跨业界的进行资源整合，同时更具可视化的结果呈现也使得研究成果的产出更容易在社会中传播。在高校所设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中，几乎每一家实验室都拥有独立域名地址的网站，这些网站结合实验室本身的技术与工具体系，构成了知识网络化生产的重要节点。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需求，社会科学实验室可以为研究者提供适用于预测、建模、仿真和试验的通用性计算平台。研究者被接入研究网络之后，实验室提供数据和模型两方面的研究支持，研究者可以在网络化的协作环境中完成更迅速的建模、更精准的模拟以及更大范围的计算，最终提高整体研究效率。这种技术架构一方面更能够发挥社会科学学者在选择问题和设计研究方面的优势，同时也使得相应的知识生产与应用创新更能产生跨界融合效应。

五、对我国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启示

在信息技术和学术范式革新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及时提出了“新文科”的发展方向，但通过梳理世界一流高校与企业的建设实践可以看出，将新兴信息技术融入人文社科研究必须建立在复合开放且技术完善的组织之上。

1. 将社会科学实验室纳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范畴，根据不同地区和高校的实际需要，协调多方建设资源，加大建设投入。随着产学研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科学实验室能够提供协助创新者有效工作、满足快速学习和培养创造能力的工作环境。为此，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将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纳入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范畴，尝试通过PPP等模式引入社会和企业资源，打造共建共享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新格局。

2. 对具有重大外部性价值的研究问题设立专项申报建设渠道，充分利用高校的智力资源盘活由政府管理的社会数据。中国的超复杂社会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富矿，但是，共同研究范式

的缺失和共享数据规范的不足影响到数据资源的协调。建议在政府、高校和企业增加对公共-私人数据源在协作、使用、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在注重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立法工作的建议，同时加快对社会科学实验室利用大数据解决现实问题制定相关的政策规范和指导方针。

3. 制定建设指导意见与细分技术标准，尤其是针对计算硬件和数据共享，充分考虑社会科学实验室对科研工作者、学生和机构的不同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学科和技术涵盖面广，对实验室建设的财政投入也不断加大，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的问题。建议建立由多学科、多领域和多行业专家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对基础性、通用性强的建设内容进行标准制定，对不同应用场景提供细分的建设指导意见，在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同时鼓励灵活创新。

4. 在新文科实验室的建设中，不应过分强调计算方法和技术效率，而冲淡人文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并不应该简单地由新的计算模型引领，而更加应该重视在社会发展问题驱动下实验室对数据的搜集与处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仅仅突出计算社会科学的范式是不够的，更需要强调问题、理论与数据匹配的“数据社会科学”。新文科实验室在对分析工具的需求上与计算社会科学相近，都强调依赖先进的分析观察工具对由数据表征的社会协调进行处理和计算。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警惕计算逻辑对社会问题和人文知识以数据形式抽象成单向度技术指标的窄化倾向，充分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王震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82；法雨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CEO，北京 100089；薛妍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82；邓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8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2期）